

#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 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马雪松

**【摘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关键分析路径,构成了实证政治理论的主体内容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前沿领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与社会科学的复杂脉络中汲取理论基石和前进动力,在实证政治理论的制度研究中形成身份认同和发展方向。在理性选择制度分析、结构诱致均衡分析、内生制度变迁分析的学理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运用多种研究模型拓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生成、制度维系与制度变迁研究领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制度分析途径、新制度经济学的纽带作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部沟通以及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可以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突出贡献、主要不足及未来展望进行综合审视。

**【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科学

**【作者简介】**马雪松,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府与政治(吉林 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0.6.216~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ZZ013)。

政治科学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步入后行为主义阶段,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先驱在关切公共选择现实议题和扩展政治制度理论前沿方面取得可观成就,并在社会科学的制度分析转向、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运动、政治科学的政策研究过渡这一宏阔背景下形成自觉意识。1989年,政治学者谢普斯勒(Kenneth Shepsle)为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发表宣言书,标志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正式获得身份认同并凝聚为学术流派。<sup>①</sup>在迄今已逾30年的发展历程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承载多重理论源流并持续更新方法工具,丰富了关于制度概念及特征、制度功能及作用方式、制度变迁类型及机制等议题的理解,但是当前研究在认识和评价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时仍存在若干不足。具体而言,一些研究者过多关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渊源,将公共选择学派经典命

题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早期主张当作这一流派的代表观点;一些研究者过多关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侧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理性选择理论的新旧分野并刻意突出不同制度研究路径的差异;一些研究者强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核心假设源自新古典经济学,或者在承认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领域和交互作用的同时,忽视社会科学的背景脉络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挥的学科板块作用。从现有研究的不足可以引申出,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出综合审视和前瞻认识十分重要。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从多学科、多源流的分析视野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历程,从多派别、多路径的演进格局中跟踪并评价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建构、方法更新与议题深化,有益于在客观评价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同时整体把握其发展前景。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石与方法工具蕴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之中,而且从社会科学的复杂脉络特别是多学科的板块运动的背景中汲取演进动力。实证政治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制度问题并同传统公共选择研究的制度分析相揖别,这标志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正式确立为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并在博弈理论、组织理论、比较历史分析、新政治经济学等主要路径上持续奠定自身研究基础和明晰发展方向。

### 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渊源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渊源是浸染着新古典经济学色彩的理性选择理论。这不仅成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得以命名的缘由,而且在为其赋予理论基础的同时还提供了实证分析传统和新古典主义研究取向,因此脱胎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具有鲜明烙印,有别于源自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与组织社会学的其他制度流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学研究经历了行为主义运动的洗礼,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及方法影响的政治学者在追求实证主义科学化目标的同时,遵循新古典主义信条的数理经济学者将视线投向政治领域的决策活动和选择行为。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重视形式化的演绎分析与数理化的研究工具,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具有原子式个体主义、一般均衡与固定偏好等核心内容,逐渐被包括社会选择向度、集体选择向度及公共选择向度的理性选择学者运用于政治生活的现实分析和理论建构。<sup>②</sup>举例来看,阿罗(Kenneth Arrow)强调政治决策的投票活动与经济决策的市场活动是社会选择的基本方式,并指出无法通过某种形式化的程序从既定个体偏好中推导出社会偏好。<sup>③</sup>唐斯(Anthony Downs)开创性地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方法论引入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指出选民偏好影响着政治制度能否稳定有序。<sup>④</sup>阿罗与唐斯所奠定的当代理性选择理论开启了公共选择的多个流派,对政治学传统研究路径与行为主义范式产生严重挑战。正如在需求显示、寻租活动、官僚体制、法律体系与联邦主义

等多个领域造诣颇丰的塔洛克(Gordon Tullock)所言,理性选择理论“在本质上是利用经济学的工具解决传统上属于政治科学的一些问题”<sup>⑤</sup>。然而,具有政治科学认同的理性选择学者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取向的均衡理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制度主义范式。具体而言,理性选择模型建立在理性假定、约束形式、策略活动与均衡结果之上,相关学者在探求个体选择的聚合形式如何为宏观过程与相关事件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由于强调作为约束形式的规则性因素及其对策略活动的影响而将之纳入制度分析。<sup>⑥</sup>值得注意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奠基者谢普斯勒在阐述政治分析的理性、行为与制度根基时,仍然将理性选择模型作为研究起点。

### 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诞生背景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诞生背景是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板块作用以及不同学科内部的相互影响。处于不同学科交界地带的组织理论,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持续发展及其对政治实践的具体解释,让关注现实政治运行的部分公共选择学者一定程度上修正新古典主义假设,并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转向过程中促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形成。

公共选择学派将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于政治生活,其中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理论命题及研究方法发挥重要影响,折射出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以及各学科内部研究取向的交织脉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制度主义提供复合资源。公共选择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理性选择模型具有内在不足的缺陷,这导致其关注对象和适用范围较为有限,经常忽视组织层面与权力逻辑。公共选择学派沿袭了理性选择理论特别是社会选择机制研究对选举活动和市场活动的重视,集中关注自利倾向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把制度界定为行动者可作为选项择定的具有严格规范形式的各式规则。<sup>⑦</sup>1984年,公共选择学者莫伊(Terry Moe)指出,不少理性选择理论学者侧重于新古典市场选择模型分析科层制问题,但是公共选择学派在经济组织理论影响下致力于超越新古典企业理论,从组织

分析的契约角度关注科层控制活动,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对公共官僚现象予以实证分析。<sup>⑧</sup>莫伊对经济组织理论的重视表明他对科斯(Ronald Coase)开创的新组织经济学路径的青睐,还反映了他对西蒙(Herbert Simon)开创的组织行为学路径的接纳。1990年,莫伊指出公共选择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立场执迷于社会选择的分析技术,错误地从结构选择中剥离政治因素,并据此呼吁应借鉴新组织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在重视权力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政治制度的实证理论。<sup>⑨</sup>与此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史及制度变迁理论学者也指出理性选择模型在政治学研究中广受批评。1990年,诺思(Douglass North)抨击工具理性与有效市场这两个新古典主义假设相比交易成本政治分析存在诸多不足。<sup>⑩</sup>在诺思看来,当代主流经济学作为事关选择理论的一门学科却对选择得以发生的背景持漠视态度,他主张新制度经济学从动态角度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关注人类提出的解释自身环境的信念,以及人类为塑造自身环境所创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制度的”<sup>⑪</sup>。公共选择学派内部具有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身份认同的学者并没有从根本上质疑新古典主义理论假设,但是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把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与固定偏好修正为有限理性与外生偏好,将策略行动置于组织环境之下,运用认知科学理论与渐进变迁分析探讨制度选择议题。因此当受诺思影响的经济学者与政治学者采取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分析途径时,不可避免地会偏离新古典主义理性模型。

### 3.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推动力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得以正式确立的推动力量是实证政治理论的持续发展。伴随实证政治理论在公共选择学派中的不断壮大,许多研究者在一般化理论旨趣的驱动下审视政治制度安排对偏好汇集和策略行为的影响,通过博弈论分析工具揭示制度选择和制度维系的内生过程,这也使制度研究更多反映出政治学的理论建构取向和科学研究色彩。

在理性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研究中,源自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均衡概念及其分析模型居于核心地

位。当公共选择学者日益采用精致化的数理方法特别是博弈论作为基本工具时,行动者固定偏好、策略行为与政治后果所导致的均衡状态,更加成为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证政治理论的基础。对均衡分析而言,社会选择理论先驱所论述的公共生活的无序性和多数决定的循环性并不那么显著,因此合理解释为何政治世界中存在如此多的稳定性成为均衡理论必须解答的重要问题。相较塔洛克所代表的主流公共选择学者以及赖克(William Riker)所代表的主流实证政治理论学者,20世纪70年代起供职于华盛顿大学的谢普斯勒与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受到罗彻斯特公共选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他们对稳定或均衡有着不同的看法,还以此为契机推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得以确立。1979年,谢普斯勒以选民集体与委员会体系在投票活动中的作用为例,指出结构诱致均衡(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有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偏好诱致均衡模型,政治行动者偏好分布变化或其他效用函数不会阻止此类均衡状态的产生,均衡存在与否以及所处位置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实效。<sup>⑫</sup>针对谢普斯勒提出的观点,赖克承认一些偏好集合能够在特定制度作用下产生均衡后果,甚至评价其代表了制度研究新的样式,但他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制度本质上作为偏好的汇集,不能把结构化均衡视为偏好的均衡,因此结构诱致均衡分析框架难以成立。<sup>⑬</sup>1981年,谢普斯勒与温加斯特在借鉴经济学新组织理论核心主张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结构诱致均衡的机理,指出实证政治分析的一般化理论主张不应以牺牲制度的必要细节为代价,抨击了简单化的偏好汇集分析难以建构有效的理论框架。<sup>⑭</sup>1986年,谢普斯勒区分了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与均衡制度(equilibrium institutions),前者指特定制度形态所产生的均衡结果,用以概括结构诱致均衡的理论主张;后者则主要从博弈过程的内生角度,探讨制度如何被选择并得以维系的问题。<sup>⑮</sup>1989年,谢普斯勒发表论文《制度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指出理性选择学者应将社会选择理论、博弈理论和决策理论运用于制度分析,并把自己归入理性选择理

论的新制度主义阵营,这意味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先驱学者同正统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证政治理论走上了不同道路。<sup>⑥</sup>贝维尔(Mark Bevir)与斯汀森(Shannon Stimson)在总结当代政治科学发展历程时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可在狭义上等同于谢普斯勒与温加斯特的学术贡献。<sup>⑦</sup>与谢普斯勒同属罗彻斯特公共选择学派的费奥里纳(Morris Fiorina)虽然对新制度主义的新颖程度提出质疑,但他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置于实证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认为实证政治理论的新制度主义优先关注理性意义上的能动性,主张偏好是给定的而且利益因素比观念因素更具解释效力。<sup>⑧</sup>

#### 4.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演进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演进同政治学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研究取向有着密切联系。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提供的学术资源也成为其延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的动力,并在博弈理论、组织理论、比较历史分析、政治经济学等主要路径上,为实证政治理论乃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积累有益探索。

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身份认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名称在20世纪90年代的提出,促使相关研究者及其成果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受到更多关注。从衍化背景与发生路径可以看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质上是英美政治科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取向的当代进展,既反映经济学新古典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交织影响,还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秉承实证政治理论。1996年,比较政治经济学家霍尔(Peter Hall)与泰勒(Rosemary Taylor)正式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命名,但是其对三个流派予以划分并进行比较的立场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呈现脸谱化的特点。<sup>⑨</sup>1999年,政治学与公共政策学者彼得斯(Guy Peters)在综述著作中提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研究主要有委托代理分析、博弈论分析、基于规则分析三种模型。<sup>⑩</sup>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演进并未在综述类文献中得到全面系统梳理,许多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内部版本或分析

路径的认识也往往忽视其跨学科、多脉络的背景。实际上,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展演进的主要线索做出把握,应重视博弈理论、组织理论、比较历史分析、政治经济学这四个主要路径。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博弈论路径而言,谢普斯勒、温加斯特、莫伊、卡尔弗特(Randell Calvert)等实证政治理论学者所促成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制度主义转向,重视制度性博弈结构在引导均衡结果方面的作用,在目标函数、职位偏好、政策偏好、逆行选择、道德风险、重复博弈等议题上深化了代理人问题,并在非合作博弈均衡的理性沟通过程方面取得进展。<sup>⑪</sup>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组织理论路径而言,谢普斯勒、莫伊等侧重政治机构与次级组织层面上的规制性过程的学者,接受科斯与西蒙各自开创的组织背景分析和组织行为分析的有益成分,并吸取诺思与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经济学新组织理论以及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自主组织理论的成果。<sup>⑫</sup>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比较历史分析而言,诺思、温加斯特、格雷夫(Avner Greif)等学者将博弈理论与微观契约理论置于历史进程和事件演进之中,为博弈分析的数理逻辑和抽象论证赋予历史素材和丰富变量,在向新制度主义经济史研究提供精致分析工具的同时,扩展了实证政治理论适用性的时空维度。<sup>⑬</sup>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而言,贝茨(Robert Bates)、列维(Margaret Levi)等学者继承并发扬了实证政治理论与新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发展方面的学术志向,关注非合作博弈的制度条件下政治与经济双重因素如何选择政策后果,并考察特定情境下不存在于关键行动者的理性博弈活动中的影响要素。<sup>⑭</sup>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内在逻辑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兼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路径,其理论建构、方法更新与议题深化构成该流派获得身份认同并不断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在理性选择制度分析、结构诱致均衡分析、内生制度变迁分析的学理基础上,分析性叙述、博弈均衡的历史研究、交易成本、否决点等代表性研究模型拓展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制度生成、制度维系与制度变迁领域的研究范围。

### 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建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建构突出体现为理性、选择、制度的复合框架,其中的持续张力与演进动力促生了相似的学理内核与相异的分析取向,建立在理性选择制度分析之上的结构诱致均衡分析与内生制度变迁分析,容纳多种方法工具与研究议题而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具内聚性和开放性。

首先,就理性选择制度分析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初期阶段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待行动者的选择活动,关注制度环境及物质因素对演化变迁与策略均衡的限制,但是不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的理解存在分歧。<sup>⑤</sup>在理性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虽致力于将理性选择与制度分析予以结合,但由于理性选择理论与有限理性理论难以调和且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张力持续存在,<sup>⑥</sup>有限理性的中间立场具有引入政治学与社会学相关分析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可能,由此增加理性选择制度分析的复杂性。<sup>⑦</sup>在选择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均衡制度与制度均衡观点涉及制度背景下的最优化选择以及使制度背景得以内生化,这要求应对行动者就制度变迁的预见能力和推动活动做出分析,并考察制度如何对行动者选择范围加以限制。<sup>⑧</sup>在制度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理解有贝茨和卡尔弗特所代表的均衡主义与诺思所代表的规则主义两种形式,前者倾向于将制度界定为某种策略均衡状态,后者倾向于将制度界定为可对行动者进行监督和奖惩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sup>⑨</sup>

其次,就结构诱致均衡分析而言,前述理性选择制度分析的内在张力促使部分学者调整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假设并更加重视结构要素,推进结构诱致均衡的理论观点愈益精致。结构诱致均衡分析反对国家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研究取向,认为个体行动者在集体选择的微观层面上扮演重要角色,并强调结构对选择活动发挥关键作用。<sup>⑩</sup>相比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其他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擅长于运用博弈论考察约束个体决策的环境,将制度结构纳入决策

制定者的策略集而对博弈论予以发展。与此同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选择置于人际互动之中,这种对制度结构予以扩展的认识方式,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制度结构的文化维度与理性选择的因果分析。<sup>⑪</sup>在构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般分析框架时,奈特(James Knight)指出社会制度是互动当中的某些人对其他人施加限制的产物,不应忽视利益分配和制度约束之间的紧张关系。<sup>⑫</sup>奥斯特罗姆也在相近意义上认为制度理论除了强调人类能动性,还应重视对人类选择形成约束的组织因素和物质因素,微观及宏观现象对不同实证理论及方法各有所需,应根据具体时空背景关注能动性与结构性的交互过程。<sup>⑬</sup>

最后,就内生制度变迁而言,前述理性选择制度分析的内在张力促使部分学者考察演化变迁与策略均衡的深层问题,更进一步探讨制度如何内在地发生变迁。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决策行动的算计特征与历史过程的效率取向,这种功利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外生倾向为制度变迁的内生视角设下障碍。<sup>⑭</sup>温加斯特较早关注内生型制度,却不无狭隘地将其理解为制度对变迁的抵制,无意于从动态角度对制度进行理解。<sup>⑮</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其他倡导者则重视内生制度变迁问题,认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能够预见制度变化的影响,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重蹈功能主义覆辙。<sup>⑯</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内生制度变迁问题上所受到的质疑,也成为其更新理论观点和丰富理论内容的契机,由此反思制度变迁的外生起源、均衡状态的僵化路径、行为偏好的静态分析。部分学者借鉴经济史、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提出内生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与叙事分析等研究路径,在吸收历史制度主义与组织分析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延展分析的时间范围并重视对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分析。<sup>⑰</sup>

### 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更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更新同该流派的理论建构与议题深化同步并进,在多源流理论取向和复合式研究平台之上汇集若干方法工具,相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早期阶段以及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这

些方法工具在现实运用中形成了分析性叙述、博弈均衡的历史研究、交易成本、否决点等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模型。

首先,就分析性叙述模型而言,有着历史研究抱负的部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分析启发,汲取跨学科分析工具而构建包含公共选择理论与博弈论方法在内的研究模型。分析性叙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借鉴故事讲述、事件解释和环境分析方法工具,从历史学中吸取推演过程和深层阐释的叙述方式,“并将之结合起来对特定时期与特定环境的事件或案例展开深度分析”<sup>③</sup>。为了将理性选择分析更好地应用于宏观维度的国际和国内现实政治经济领域,贝茨、列维、温加斯特、赖汀(David Laitin)等学者在具体问题的驱动下调整研究策略,对案例的外部情境和内部脉络采取过程分析以探究相关因果机制,并在契合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的基础上“将产生结果的过程模型化,力图抓住故事的本质”<sup>④</sup>。

其次,就博弈均衡的历史研究模型而言,部分学者为克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内生制度变迁解释力不足、博弈分析过于静态化、时间范围较为有限等问题,在博弈均衡框架下考察历史进程中制度变迁的内生起源。理性选择理论难以解释均衡的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比较静态分析使之更关注制度变迁的外部因素而忽略内生变迁议题。以格雷夫与赖汀为代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运用博弈均衡方法,将变迁的内生起源概括为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sup>⑤</sup>他们将制度强化与准参数这两个操作性概念纳入历史过程分析,提出“制度在某一情境之下通过准参数,对外生于制度的相关因素产生影响,而准参数反过来也会影响制度的维系,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制度的自我强化效果”<sup>⑥</sup>。

再次,就交易成本模型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与有限理性的应用研究,影响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理性基石、选择理论与制度衍化的认识,具有经济学背景的理性选择学者的制度分析尤为重视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与合约形式。温加斯特、莫伊、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探寻交易活动中各方承担

成本、协议制定、预期意外情况、新环境下协议解释机制设计,留意于对承诺的强制执行以及对违反协议情况的处理,并将之视为涉及政治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制度结构议题。<sup>⑦</sup>值得一提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交易成本模型在行为经济学研究视角与核心议题的启发下,关注“内在利他性偏好、特定参照系统、道德伦理规范与普遍认知偏差”这些宽泛意义上的结构要素以及此前被看作能动性的要素,由此容纳文化研究和认知研究的诸多成果。<sup>⑧</sup>

最后,就否决点模型而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者兼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将理性选择、策略行动、制度约束与政治后果等要素构筑为否决点理论框架。这一模型的提出者是博弈论取向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泽比利斯(George Tsebelis),以及比较政策分析取向的历史制度主义学者伊梅古特(Ellen Immergut)。<sup>⑨</sup>否决点模型对政治行动者及其策略以及策略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框架予以区分,认为制度构成政治行动者策略行为的脉络和背景,能够改变政策领域当中冲突所造成的结果。<sup>⑩</sup>否决点模型采用理性选择与最相似系统设计方法,考察利益集团如何在自利动机驱使下将政策议题转移至其可以进入的领域,借助制度性否决权阻挠反对者的立法提案,从基本概念和理论假设入手对现实政策案例展开分析。<sup>⑪</sup>

### 3.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议题深化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议题深化反映了在理论建构与方法更新的驱动下,理性选择的制度分析对制度概念及特征、制度功能及作用方式、制度变迁类型及机制的认识愈加深入,特别是针对制度的生成机理、维系路径与变迁逻辑形成了同其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有所差异又彼此借鉴的研究成果。

首先,就制度生成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早期阶段较多从设计论、选择论、演化论的角度看待制度的起源及产生问题,其后在运用组织、均衡、权力、演化等制度分析视角的过程中提出更具自身流派特点的主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有着设计论倾向的规

则分析、委托代理分析与博弈论分析,在制度生成议题上不同程度地认为制度功能与行动者有意设计存在联系。<sup>④</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有着选择论倾向的政策分析路径认为,具有理性能力的个体为了治理自身事务,能够对规则和相关成本收益情况进行前瞻把握,据此在文化历史背景及资源脉络中对制度做出选择。<sup>⑤</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有着演化论倾向的制度生成观点,认为包括制度在内的社会规则是“处于均衡状态的行为标准或行为惯例,其从社会规则所描述的博弈中衍生而来”<sup>⑥</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目前在公共政策与比较历史分析方面的成果更加重视政治生活的权力因素与冲突关系,主张制度起源不仅是个体行动者追求集体利益的结果,更是政治背景下权力冲突的产物。这表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虽然强调理性基础与利益算计,但是在制度生成议题上同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并非不可兼容。<sup>⑦</sup>

其次,就制度维系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早期阶段便将制度长期演变和生存作为研究重点,考察制度如何通过自我实施以抵制变迁。<sup>⑧</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进一步提出“特定制度所产生的内生性选择包含其自身的长久稳定和持续生存”,并从制度的自我实施与非连续变迁两个方面深化了制度何以维系的议题。<sup>⑨</sup>但是对于主张制度源于权力格局和社会地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来说,制度起源与制度维系各自的逻辑并不相同,后者并非单纯基于行动者的理性选择,而是主要依赖于行动者对制度的理解以及制度被执行的方式。<sup>⑩</sup>与之相近的观点认为,处在结构背景下的不同个体虽然数量变化且发生流动,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制度维系的看法同历史制度主义能够相容。<sup>⑪</sup>以列维为代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拓宽了制度维系的研究视阈,提出制度确立以后总是不同于起始阶段,偏好与偏好次序并非不可改变但具有一定黏性,因其易于受到操纵而可能转化为其他形式。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基于自我利益的制度维系的看法,明显有别于比较历史分析对国家制度作用的侧重。<sup>⑫</sup>

最后,就制度变迁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早期阶段往往将制度变迁视为不重要的问题予以忽略,或者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不连续的事变过程。以制度变迁的内外来源为例,部分研究者将经济假设与制度主义观点结合起来,主张个体主要由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愿望驱动,制度则对个体选择活动加以限制。<sup>⑬</sup>以变迁的本质特征为例,部分学者指出理性主义路径将制度的实质理解为均衡,难以从动态角度考察制度变迁。<sup>⑭</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制度变迁议题上的外生性、功能性、静态性特征,受到很多研究者的批评。例如,西伦提出将制度视作均衡的看法不利于对制度设计与制度中的行动做出区分,内生变迁的可能性也因此降低;<sup>⑮</sup>彼得斯认为过于强调行动者的合意动机与策略手段,导致此类研究可能无意于区别制度设计与制度变迁,或者将制度变迁看得易如反掌。<sup>⑯</sup>针对上述批评,结构诱致均衡取向的谢普斯勒通过分析修改程序、解释性裁断、免责规则、宣布无效、搁置规则与紧急权力,概括了制度变迁内生机制的若干形式;<sup>⑰</sup>新制度经济学取向的诺思则在制度变迁研究中不断强调信念与信念体系所发挥的内生作用。<sup>⑱</sup>

###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意义评析

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流派和分析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理论与政治制度研究中脱颖而出,并在多重学科背景和研究脉络下积累丰富成果,这反映出该流派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意义评析应涵括其突出贡献、主要不足及未来展望,对此可从理性选择理论的制度分析途径、新制度经济学的纽带作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部沟通以及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加以认识。

#### 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贡献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为分析宏观政治现象提供微观基础的同时,还为政治制度演进提供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工具,其主要贡献集中体现于施展实证政治理论抱负并主动吸取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以及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发挥独特作用并不断丰富政治学研究内容。

首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过保留理性选择的理论内核,施展其实证政治理论的科学化研究抱负。针对理性选择理论在立法机关、国际竞争、市场环境研究中的集体行动难题,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加强调整博弈规则与策略均衡的制度结构,在制度稳定与制度起源方面扩展了理性选择分析的应用范围。<sup>④</sup>在新古典经济学与实证主义政治学的科学化抱负的驱动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体现出明显的实证政治理论色彩。相比政治学的其他研究途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致力于以明确的系统性方法论研究制度功能问题,采取均衡分析对制度约束下的行为及后果进行预测,运用精致的制度变迁模型为宏观政治现象提供微观基础和分析范例。<sup>⑤</sup>

其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过强调自身的经济学渊源,主动吸取新制度经济学的新近研究成果。理性选择理论取向的新制度主义学者不仅采取策略均衡这一途径,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注重交易成本分析,其中以华盛顿大学为学术纽带的一批新制度经济学者致力于考察制度执行与制度演化问题。<sup>⑥</sup>相比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其他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沟通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方面更为出色,并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个体理性与制度结构的相关假设,使历史进程和路径依赖方法得以兼容,而且在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导致企业策略存在系统差异这个论题上推进了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sup>⑦</sup>

再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过占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席之地,在同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建构制度主义的并驾齐驱中相互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得以诞生的背景是政治学者在组织社会学与制度经济学成果影响下,日益重视制度分析并探索新的研究取向。理性选择理论的新制度主义转向则促使历史社会学、新国家主义与美国政治发展领域学者汇聚在历史制度主义的阵营之中,并对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予以关注。<sup>⑧</sup>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最早形成身份认同的流派,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提供联结渠道与对话平台,不同流派由于关键学者的观点争鸣与核

心议题的发展演进相互启发。

最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过坚持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及个体主义立场,在政治学的制度分析中深化结构性与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政治学受到社会科学中理性与经验、解释与诠释、结构与功能内在张力的影响,相比早期阶段更多具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及个体主义取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真实政治世界的关注以实证理论与方法为基本依据,以程度不同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为研究特色,同其他强调结构性因素的政治分析路径存在分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理性选择分析基础上探讨权力运行、社会架构、文化体系、认知框架,实际上有助于增进政治学在结构性与能动性关系方面的理论认识。<sup>⑨</sup>

## 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不足

在肯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此前发展阶段与其他制度分析路径具有优长的同时,还应注意从前述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政治科学四个层面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局限因素。

首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由于一定程度上承袭理性选择理论,部分学者认为其分析视角和研究倾向存在若干学理难题。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待人类动机的方式过于简单化,并未克服此前理性选择理论在功能主义、意图主义与志愿主义方面的内在缺陷。<sup>⑩</sup>在一些社会学者看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仅保留理性选择理论的逆向推演逻辑,将先于后者存在的因素或发生的事件误判为造成后者的原因;还往往忽视政治生活中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在运用历史分析时对其施加太多限制条件;将分析模型与社会现实直接等同起来的做法,很可能使理性选择的行动表象与认知机理被混为一谈。<sup>⑪</sup>

其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时,并未充分吸纳其中更具价值的理论主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华盛顿学派那里引入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分析工具,并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的斯坦福学派特别是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的研究成果而强调制度是信念的自我维持

系统。但是由于有限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内在差异,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组织分析之间对信念和文化的不同认识,众多新制度经济学所主张的文化信念与公共知识,没有得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应有重视,相比之下不如其他政治学者更认可“文化预期作为历史继承的博弈结构特征的共有知识”对制度过程所发挥的稳定作用。<sup>⑩</sup>

再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其他流派存在深层分歧,由此受到颇多尖锐质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较早崭露头角的历史制度主义以及作为后起之秀的话语制度主义,均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出批评。历史制度主义基于历史延续和时间演进的角度,指出理性选择理论看重自我实施均衡机制的内生性,致使非连续性制度变迁模型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来说更具吸引力。<sup>⑪</sup>建构制度主义基于利益的主观性和建构性,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愈发重视观念研究路径,但它的工具理性假定自始至终强调客观性和物质性的利益并和观念相分离,因而狭隘地把利益视为只是理性行动的激励结构的某种反映。<sup>⑫</sup>

最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运用与作用,同样受到自身流派和政治学者的质疑。理性选择比较政治学特别是其中的比较历史分析的局限体现在,数理化和形式化的研究取向往往偏爱那些程式化的事实而非具体观察和详尽细节,因此难以从叙事角度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对其做出可信说明,而且对于作为政治科学核心概念的权力,往往无法在理性主义分析框架下进行充分运用。<sup>⑬</sup>不具理性选择理论立场的政治学者也在近似意义上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往往以理性化的方式看待社会科学的性质,这会使其过多强调自身有别于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而且在重视预测能力和经验证据方面也倾向于政治科学的实证经验主义传统。<sup>⑭</sup>

### 3.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展望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产生和衍变始终受到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当前发展的深刻影响,在政治科学新制度主义运动中的重要角色以及沟通政治学与经济

学的突出作用,使其不仅能够获取持续发挥优势并逐步克服缺点的有利条件,还可通过自身调整、应用研究、追踪前沿及开放边界实现更好发展。

首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展的前景反映在其对政治学其他研究领域的影响,还表现为在经受质疑当中修正自身假设并调整分析工具。作为政治学中最具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途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尤为看重个体行动者能动性汇聚与政治生活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而居于社会科学现代主义理论及方法论的核心地带,契合社会科学所强调的能动与结构这一根本议题。在运用于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等研究领域过程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研究取向的张力,以及其后现代主义与诠释主义的彼此争锋中获得动力。列维在此意义上认为这一流派步入迅速成长的阶段,并对其今后发展抱有信心。<sup>⑮</sup>

其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展的契机蕴含于其广泛的应用中,理性选择理论学者在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政治分析、公共政策分析当中积累制度研究成果并拓展新的方向。许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的研究取向难以简单通约,但是他们在特定问题导向下针对相关案例而适用分析工具时,分别侧重关键行动者的策略选择、政治经济制度结构的影响、利益分配及权力冲突的约束后果、分析叙述对重要变量和因果机制的揭示等方面。多样化的理论主张和分析工具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早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的顾虑,即实证政治理论可能对其他学者看重的国家、公共官僚、自主性、国家社会关联等议题漠不关心。<sup>⑯</sup>

再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展的背景包括社会科学的前沿领域与各学科板块构造下的研究转向,其中观念研究、认知研究以及行为经济学的相关成果尤为重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实证主义政治理论的主体内容,更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双向互动提供了有益平台,但是实证主义立场以及对客观性和物质性利益的重视,使之对建构主义的主观性和真实性利益分析存在明显拒斥,那些难以观察和测度的观念性和认知性因素也被有意忽视或无

意漠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其中强调认知分析的学者影响下,有望继续吸收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而且在这种学理渊源和学科脉络中可能同行为经济学发生耦合。<sup>⑦</sup>

最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彼此交融的趋势,其中与历史制度主义及建构制度主义的互动最为重要。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立足微观面向宏观,历史制度主义则立足宏观走向微观,两大流派有望构建起更有解释力的制度理论,凭借理论与经验的共同检验、偏好的内生与外生特性、微观基础与宏观历史的结合、功能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调适四个切入点实现有机整合。<sup>⑧</sup>建构制度主义有助于启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运用话语的交互性视角说明行动者的内在偏好与行动策略,促使其突破路径依赖的藩篱并从动态的视角将制度变迁理解为内在于行动者的构造物,从而为制度变迁分析提供有别于固定偏好和物质利益的解释逻辑。<sup>⑨</sup>

#### 注释:

① Kenneth Shepsle, "Studying Institutions: 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 No. 2, 1989, pp. 131-147.

② 马雪松:《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Kenneth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2.

④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者序第1-3页。

⑤ 戈登·塔洛克:《公共选择》,柏克、郑景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页。

⑥ Mark Ivr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7-128.

⑦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Politics: Performance and Outcom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4, 19.

⑧ Terry M. Moe,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 4, 1984, pp. 739-777.

⑨ Terry M. Mo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Neglected Side of the Stor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6, No. 1, 1990, pp. 213-253.

⑩ Douglass C. North,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 No. 4, 1990, pp. 355-367.

⑪ 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12页。

⑫ Kenneth A. Sheps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quilibrium in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1, 1979, pp. 27-60.

⑬ William H. Riker, "Implications from the Disequilibrium of Majority Rule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432-446.

⑭ Kenneth A. Shepsle and Barry R. Weingast, "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 and Legislative Choice," *Public Choice*, Vol. 37, No. 3, 1981, pp. 503-519.

⑮ Herbert Weisberg,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6, pp. 51-52.

⑯ Kenneth Shepsle, "Studying Institutions: 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 No. 2, 1989, pp. 131-147.

⑰ Robert Adcock, Mark Bevir and Shannon C. Stimson,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Anglo-American Exchanges Since 18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60-261.

⑱ Morris Fiorina,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y*, Vol. 28, No. 1, 1995, pp. 107-115.

⑲ Peter A. Hall and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4, 1996, pp. 936-957.

⑳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 51-52.

㉑ R. A. W. Rhodes,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2; Jeffrey S. Banks and Eric Allen Hanushek,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Old Topics, New Dire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25-226.

㉒ Terry M. Moe,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4, 1984, pp. 739-777.

⑳ Douglass C. North, John Joseph Wallis and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㉑ Robert H. Bates, *Open Economy Polit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Coffee Tra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garet Levi, *Consent, Dissent and Patrio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㉒ Daniel Beland, *How Ideas and Institutions Shape the Politics of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6.

㉓ Ove K. Pedersen, "Nine Questions to a Neo-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14, No. 2, 1991, pp. 125-148.

㉔ Junko Kato, "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ity in Politics: Three Varieties of Neo-institutionalis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y*, Vol. 26, No. 1, 1996, pp. 553-582.

㉕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

㉖ John L. Campbel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4.

㉗ Robert H. Bates,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Rational Choice: A Review Essa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3, 1997, pp. 699-704.

㉘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 54.

㉙ 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

㉚ Elinor Ostrom, "New Horizons in Institution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1, 1995, pp. 174-178.

㉛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1984, pp. 734-749.

㉜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75.

㉝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

㉞ Edward Anthony Koning,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Understanding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Chang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36, No. 4, 2016, pp. 639-664.

㉟ 马雪松:《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一项学科史考察》,《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㊱ 罗伯特·贝斯等:《分析性叙述》,熊美娟、李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㊲ Avner Greif and David Laitin, "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4, 2004, pp. 633-652.

㊳ 马雪松:《政治世界的制度逻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84-185页。

㊴ R. A. W. Rhodes,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4.

㊵ 马雪松、吴健青:《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理论探讨》2019年第5期。

㊶ Jon Pierre, B. Guy Peters, Gerry Stoker, *Debating Institution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

㊷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2.

㊸ 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宁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㊹ B. 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 65-67.

㊺ Elinor Ostrom,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ward Comple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1, 1991, pp. 237-243.

㊻ 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陆铭、陈钊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㊼ Junko Kato, "Institutions and Rationality in Politics: Three Varieties of Neo-institutionalist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y*, Vol. 26, No. 1, 1996, pp. 553-582.

㊽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68, 175.

㊾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p. 660–661, 689–692.

⑤3 Elinor Ostrom, "New Horizons in Institution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1, 1995, pp. 174–178.

⑤4 Jon Pierre, B. Guy Peters and Gerry Stoker, *Debating Institution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

⑤5 Ira Katznelson and Barry R. Weingast, *Preferences and Situations: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pp. 240–242, 325.

⑤6 Edward Anthony Koning,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Understanding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Chang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36, No. 4, 2016, pp. 639–664.

⑤7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

⑤8 Orfeo Fioretos, Tullia G. Falletti and Adam Sheingat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57.

⑤9 Jon Pierre, B. Guy Peters and Gerry Stoker, *Debating Institution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

⑥0 Barry R. Weingast and Donald A. Wittma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30–1048.

⑥1 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⑥2 Patrick Baert and Filipe Carreira da Silva, *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p. 139–140.

⑥3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8.

⑥4 Jame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42.

⑥5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16.

⑥6 Robert Adcock, Mark Bevir and Shannon C. Stimson,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Anglo– American Exchanges Since 18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80–281.

⑥7 Ira Katznelson and Barry R. Weingast, *Preferences and Situations: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5, pp. 15–16.

⑥8 Peter A. Hall and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4, 1996, pp. 936–957.

⑥9 Patrick Baert and Filipe Carreira da Silva, *Social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p. 145–151.

⑦0 青木昌彦:《制度经济学入门》,彭金辉、雷艳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66–167页。

⑦1 Wolfgang Streeck and Kathleen Thelen,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⑦2 Vivien A. Schmidt,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2008, pp. 303–326.

⑦3 Mark I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0.

⑦4 Vivien Lowndes and Mark Roberts, *Why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35.

⑦5 Mark Iving Lichbach and Alan S. Zuckerma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3.

⑦6 Terry M. Mo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Neglected Side of the Stor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Vol. 6, No. 1, 1990, pp. 213–253.

⑦7 马雪松、吴健青:《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理论探讨》2019年第5期。

⑦8 Kathleen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s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1999, pp. 369–404.

⑦9 Vivien A. Schmidt,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 No. 1, 2010, pp. 1–25.